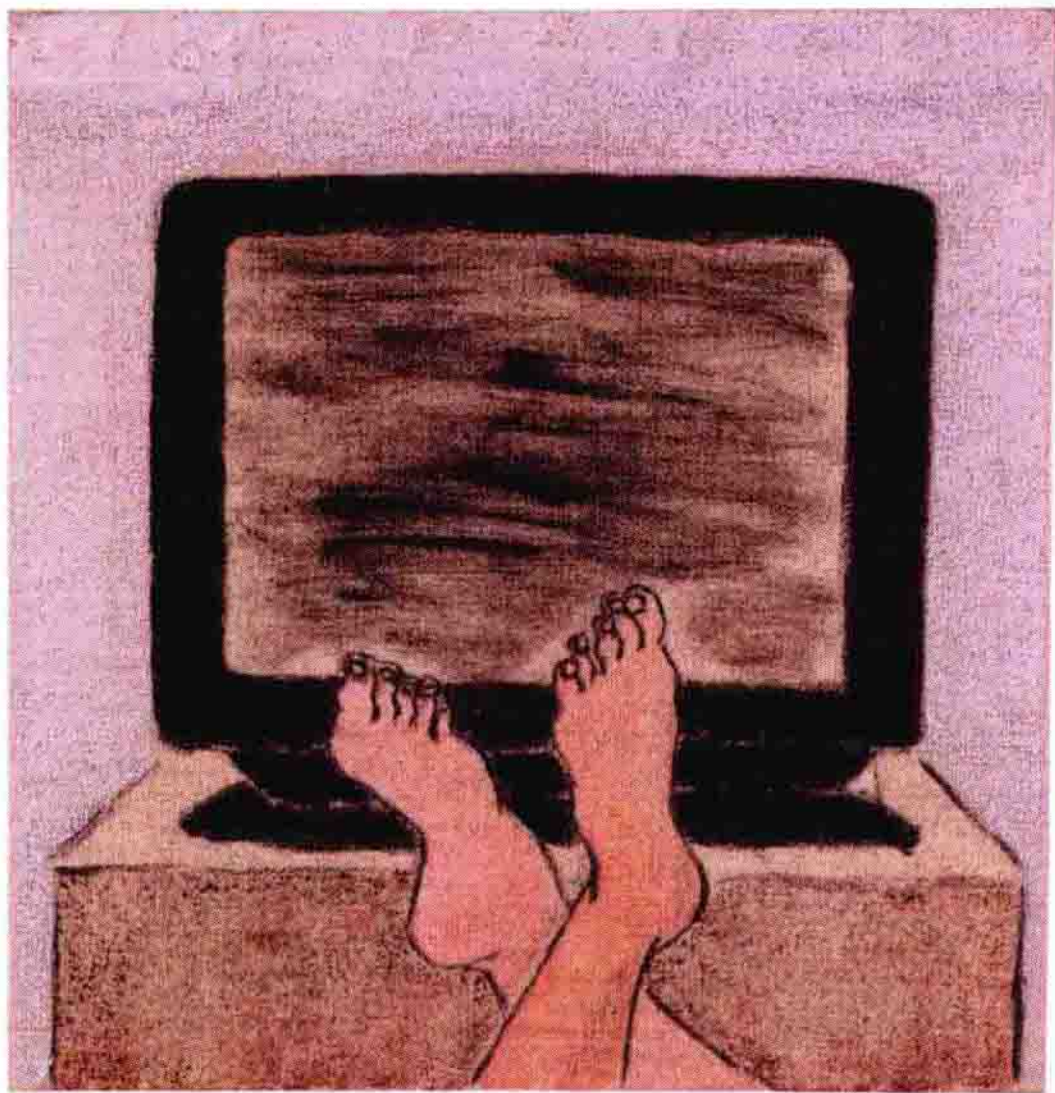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让-菲利普·图森



电视

李建新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菲利普·图森

电 视

李建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 / (比) 图森著; 李建新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1

(图森作品集. 5)

ISBN 978 - 7 - 5404 - 6566 - 7

I. ①电… II. ①图…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比利时 - 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1329 号

电 视

著 者: 让 - 菲利普 · 图森

译 者: 李建新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9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6566 - 7

定 价: 2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视

让-菲利普·图森

电 视

李建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PHILIPPE TOUSSAINT

LA TÉLÉVISION

© 1997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7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我停止看电视了。一下子，决定性地，就不再看任何节目，甚至连体育节目也不看了。我是在六个多月以前停止看电视的，七月底，正好在环法自行车赛结束时。我当时在柏林的公寓里像所有的人一样，平静地观看了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阶段的转播，香榭丽舍阶段，这段比赛以一阵大规模的冲刺，由乌兹别克人阿杜雅帕罗获胜而告结束，然后我站起来，关上了电视机。我非常清楚地回想起我当时做的动作，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灵活、重复了上千遍的动作，伸出胳膊，压在按钮上，图像破碎并从屏幕上消失了。这便结束了，我便再也没有看过电视。

电视机一直在客厅里，被扔在那儿，关闭着，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它。它肯定还能用，只要嵌一下按钮就可以看了。这是一个老

式的电视机，黑色方形，放在一个上了漆的木座上，木座由两部分组成：托台和木座腿，腿的形状是一本黑色的垂直打开的薄书，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指责。屏幕，颜色难以形容，说不上是绿色，灰扑扑的不怎么起眼，稍稍有点儿凸。接收器，一侧有一个专为各种控制按钮设计的小格子，顶上有一个很大的 V 形两角天线，可以与龙虾的两只触角媲美，此外又像把手，以便在人们想更加彻底地甩掉它时可以抓起天线把电视机提起来扔进开水锅里。

今年，我独自在柏林度过了夏天。德隆，与我一起生活的女人，在意大利度过了假期，带着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和我们还未出世的小宝宝，一个小女儿，依我看。事实上我认为是个小女儿，因为妇科医生在做超声波时没有看见阴茎（通常，如果没有阴茎，就是小姑娘，我是这样解释的）。

电视在我的生活中并不是很重要。不重要。我平均每天看一两个小时（甚至可能还要少些，但我宁愿夸大事实也不愿为了迎合我的说法而低估事实以求有利）。除了一些重大的我总是很乐意追踪的体育赛事，以及新闻或某些我有时也看一看的选举报道，我是不怎么

看电视的。例如，出于原则也出于方便，我从不看电视上的影片（就像我不读布莱叶盲文书籍一样）。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但从未真正地验证过，我可以毫无困难地随时停止看电视，不会感到任何烦恼，换言之，我对它没有一丁点儿的依赖性。

然而，几个月以来，我发现我的行为有了些许小变化。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待在屋里，没刮胡子穿着一件非常舒适的旧羊毛套衫，一连三四个小时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点儿像猫躺在草垫上，这便是我养成的过分随便的习惯，光着脚，手放在阴部。我，就这样。正巧，事实上，那一年，与以前每年相反，我在电视上从头到尾观看了法国参加国际网球赛的运动员比赛的进展情况。开始时，我只是时不时地看场比赛，然后，到了复赛阶段，我开始真正对联赛的结果感起兴趣来，或至少为了尽力说明一动不动地在屏幕前度过的那些长长的下午，我是这样向德隆解释的。那些日子我通常是独自待在家里，不过，有的时候，还有女佣，她在客厅里我的身旁熨着我的衬衫，因抑制着愤怒而默不作声。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比赛的转播从中午开始，直到半夜才结束。看完这些转播后我便感到恶心和疲乏不堪，大脑一

片空白，腿发软，眼睛模糊。于是我去洗淋浴，长时间地用温水冲着脸。晚上剩下的时间，我都是无精打采的，而且，尽管要承认这一点我还有些顾虑，但我还是不得不屈从于这个事实：自从我开始不知不觉地上了四十岁以后，我就再也不能从体力上打满五局网球。

此外，我那时无所事事。我说无所事事，意思就是不干任何不动脑筋或受拘束的事，不做任何被习惯或懒惰所左右的事。我说无所事事，意思就是只做重要的事，思考、读书、听音乐、做爱、散步、游泳、采摘蘑菇。什么也不干，与人们可能很快就会想象到的相反，需要方法和纪律，需要思想开放，需要全神贯注。现在我每天游泳游五百米，每小时两公里，这个速度很慢，我承认，它正好相当于一刻钟游二十个泳池那么长，也就是一小时游八十个泳池那么长。但我并不追求什么成绩。我慢慢地游着，像个老太婆（但不戴帽子），大脑处于理想的状态，一片空白，专心于我的姿势和躯体，只考虑我的动作及其规律性，嘴巴半张着在水面上呼吸并吹起一簇啪啪作响的小水泡。慢慢地，微蓝的游泳池里那清澈的水流从四面八方环绕着我的肢体，我向前伸出胳膊长长地分开水面，而我的双腿在齐膝处合拢，

并且，在同一时刻，当我的两只胳膊慢慢地再次展开的时候，我的双腿以同样协调而又同步的动作把水流推向后面。总之我现在很重视洗浴，把它列入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一类，我曾经有些轻视它并将它远远地排在肉体性爱的后面，但肉体性爱直到现在还是我比较喜欢的活动，除了思考，当然。事实上我非常喜欢做爱（有好几个理由），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提及我在这方面的姿势，此外它更像做一个蛙泳动作那样躯体平静而不像游四百米蝶泳那样精力旺盛手忙脚乱地自充好汉，我尤其会记住做爱给我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平衡，并且，搂抱过后，当我躺在柔软的床单上深思同时品尝着那顷刻间流逝的纯粹快感时，我就感到有一种克制不住的愉快心情流露在我的脸上发出意想不到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调皮而又会意的亮光。而游泳带给我同样的满足，躯体同样的膨胀，它，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地，就像波浪，蔓延到大脑带来微笑。

因而我认为，完全忙于无所事事，我不再有时间看电视。

电视播放出场景，但不是现实的场景，尽管它具有现实的一切表象（此外还要更小些，

我要说，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看过电视)，而是它的表现。确实，电视用彩色和两维空间在表面上对现实进行的中立表现乍看起来好像比现实更可靠、更真实可信、更精练、更间接得多，演员们凭借这一点在他们的作品中给人以现实的一种图像。但是，如果说演员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现实，那是为了了解世界并抓住其本质，而电视，如果说它表现了现实，那是它与生俱来的，一不留神，可以说，纯粹是由技术决定的，毫无人工的痕迹。然而，并不是因为电视播出了现实的一个熟悉的、立即就被识辨出来的图像，就可以把电视播出的图像和现实看作是等值物。因为，除非认为，现实为了真实，应当与它的表现相似，否则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画的青年男子的肖像其忠实于现实的程度不如一个正在小小的屏幕上介绍电视新闻、在其国家作为举世闻名的主持人那从外表来看毋庸置疑的视频形象。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里对现实的虚幻表现，从颜色和着色，从油画颜料和在画布上的挥刷，从轻微的修改到画笔甚至到手指，从那在还稍稍有些湿润的亚麻籽油颜料中用拇指边随便刮一下的动作，从面对栩栩如生、有着身体发肤、衣料或衣褶的生灵，从面对着一

个复杂的人物，人，有着其缺陷和弱点，有着一段历史，有着高贵、感觉和目光——确切地说，多少平方毫米的色彩能体现着这个穿越了数个世纪的目光的力量？——在这样基础上的虚幻表现从本质上根本不同于当电视表现现实即一个简单的纯技术性的机械结果时，电视所播放的虚幻表现。

那年，为了致力于编纂关于提香·韦塞尼奥的论著，我决定独自在柏林度过夏季。几年来我一直在计划写一本关于艺术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的巨著。我的计划逐渐地集中到意大利的十六世纪，特别是提香·韦塞尼奥和查理·坎的身上，直至将有关画笔的一段不可信的插曲作为论著的中心标志并以它命名——《画笔》。根据这个插曲，查理·坎曾在提香的画室里弯下腰去捡一支刚刚从画师手中掉落的画笔。我在那年的年初丢开了在大学里教书的工作来休年假以便能够专心于准备这部论著。同时，由于获知在柏林有一个私人基金会可能会帮助像我这类的研究者们，我便提出了助学金申请并整理了一份材料。在这份材料中我仔细地描述了我的计划，特别强调了我应该去奥格斯堡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性。1530年查理·坎曾在这座城市居住过而我却不知道其日期

(我，日期)，特别是在那里提香曾为查理·坎画了好几幅特别著名的画像，例如，在普拉德的那幅著名的骑士画像，以及查理·坎坐在慕尼黑美术馆前，脸色苍白神情悲怆，手里拿着一只手套的那幅画像。不用说，在奥格斯堡的逗留对我来说将是非常珍贵的并能极大地丰富我的知识，但是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承认这一点，即这个关于提香·韦塞尼奥的计划并不是非定在德国不可，不像我为了申请得到这个奖学金而曾编写的那本表达巧妙的学术论文那样，尽力让人相信它特定在德国。例如，从巴黎去奥格斯堡根本不比从柏林去奥格斯堡更困难。理想的可能是慕尼黑。不过最终（就这样）我得到了奖学金，于是我们三个人全都来到德国生活。德隆，七月初时就带着两个孩子出发到意大利度假去了，一个牵在手上，另一个还在她的肚子里（当人们像她那样手里总是提着数不清的手提箱和行李的时候这真是方便极了），我送他们三个到机场，我拿着机票。我在机场大厅里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朝离港通告牌走去，抬起头手里拿着机票，用一种困惑的神情将两者对照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又回到在小推车旁等着我的德隆那儿，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那次居住在柏林期间所说的话是否应该全都在这里这样忠实

地转述——二十八号门。你肯定吗？德隆说。我迟疑了一下。二十八号门，是的（我回过头去核对了一下）。出发前我们长时间地拥抱接吻，我在二十八号门的登记台前向他们告别，用手轻轻地摸了摸我儿子的头顶，伸进我的德隆的羊毛套衫里温柔地摸摸她的肚子，然后看着他们走进金属探测器那简便的小拱门。再见，再见，我儿子挥着手（我现在想哭：我就是这样，我）。

回到家以后，我稍稍整理了一下东西，仔细地清理了我的工作室，为我的工作做好一切准备（我曾打算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着手撰写我的论著）。我开始把工作室里黑色大书柜上的东西全部搬出来，那上面堆放着自从我来到柏林以后的大量文件。有邮件和发票、名片、各种与论著的准备工作有关的还未分类的文件，几个零币和一些陈旧的音乐会入场券，以及我非常仔细地保存下来留作以后慢慢阅读的大量法文和德文剪报。我大概是非常细心地逐日将所有这些文章剪了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地回想起自己坐在工作室里小心翼翼地剪着这些文章然后站起来将它们放到书架的一个隔层上与其他那些同样仅仅是供以后扔掉的剪报放在一起，如果不是供我某天阅读的话。书架

一被完全腾空，我便开始分拣这些剪报。我安逸地盘着腿坐在工作室里，穿着那件旧的长宽袖羊毛套衫，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上，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垃圾袋打开放在身边，从围在四周一堆堆的剪报的最上面拿起一篇一篇的剪报，开始自然而然地草草浏览一遍，完全是机械性的（有时，我甚至进一步扩展我的档案保管员的责任意识站起来去书桌上拿来一支笔在某个段落上加注，给某个句子画上着重线，在某篇剪报上标明日期），然后将它们扔进垃圾袋，只留下极少量的经过高度挑选的范本，预先饶有兴趣地等待着之后的阅读，当我整理完工作室以后就把它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然后我稍稍打扫了一下房间，打开朝着阳台的落地窗让工作室好好地通通风，将小地毯拿到室外抖了抖，把放在床上的小箱子和画夹搬下来。各种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我将闹钟调到七点差一刻把它放到卧室里，最后一次核实了公寓里的一切都整齐有序，工作室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书桌整理得井井有条，电脑旁放了一令没用过的白纸，书和资料都排列整齐以备翻看，我便轻轻地关上了工作室的门来到了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就这样，经常，晚上，最后这段时间，我